

如何重建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

王建华^{*}

〔摘要〕 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创新。为了满足对于创新的期待,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在以论文发表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中越陷越深。其结果,作为思想中心的大学逐渐被作为知识工厂或科学重镇的大学所取代。重建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要从大学之用转向大学之思,重申大学的制度含义,重建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以思想创作孵化创新思维。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学;制度;创新;用途;思想

从演化的角度看,每一时代的高等教育都在不断演化;但从建构的角度看,每一个时代的高等教育又都在重建。当然,无论演化还是建构都只是一种理论视角或分析框架,实践中无论哪个时代的高等教育都绝对无法分清哪些是演化而来的,哪些又是重建的。一般而言,演化理论适于分析长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而建构主义则适于分析短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我们时代是一个国家主义的时代,以国家为主体的建构主义主导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尤其是在我国,以改革促发展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常态。基于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命题,亦即如何重建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

一、创新的匮乏及中国特色

对我们时代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创新。如果说在农业时代,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人口的增长来驱动;工业时代,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源驱动;那么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的发展将主要依靠创新来驱动。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创新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它既不同于人口的可再生性,也不同于某些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人类社会中的创新的产生既受社会需求的影响,又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在千年尺度的视野下,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绝对是小概率事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人类的思维、制度与技术都是停滞的或极其缓慢的演进。以西方为例,根据克鲁伯和格雷的统计,公元前500年是西方文明创造性的顶峰;从公元850年到公元1935年还有三次创造性突发期,分别是1620年代,1830年代,1900年代。创新的第一次大量涌现出现在雅典城邦时期;第二次大致在“文艺复兴”时

^{*}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人员,210097。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880066)研究成果。

期;第三次和第四次分别在19世纪初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替处,与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大致重叠^①。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创新的匮乏都有其合理性。毕竟对人类而言,日常生活的持续需要相对的确定性。无论思想、制度还是技术的创新都极易引起社会的革命和不稳定,进而造成民众心理的恐慌。毕竟创新的发生或天才的存在总是体现为对现有秩序的反抗或破坏。因此,传统社会的制度安排会自动地抑制创新的发生。“与现代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在一切都依照惯例的传统社会里,科层、级别、地位、教养、服从命运、抑制个体创新的冲动,这些因素联系支撑着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很自然,传统社会的经济生活只有缓慢的发展。”^②直到资本主义兴起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种种桎梏,创新才真正受到激励。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两百年里,人类迎来了自身创造性的黄金时代。

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创新一直是我国政府实施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目标,但政府主导的种种创新计划并未能产生预期中的实质性的创新成果。究其根本,既有高等教育体制对于创新活动的抑制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由于顶层设计的原因,条块分割,条条分割,块块分割的问题比较严重。虽经多年改革,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因行政管理而造成的隔离体系依然普遍存在。在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不同水平、不同产权制度的高校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而且高校系统与科学院系统、企业系统、政府系统之间也缺乏“立交桥”。由于组织内与组织间的相互隔离已经制度化,高等教育的每一次改革都只能是局部的改革,而每一次局部的改革又会促使高校之间的隔离进一步的制度化。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驱动下,我们的一切改革客观上都强化了这种隔离体系的自足性。无论重点学科建设、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均是如此。即将实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同样也只是着眼高等教育系统“塔尖”部分,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影响不大,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推进也微乎其微。回顾我国最近几十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增加经费投入一直是政府部门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或改革抓手,制度的变革或体制的创新比较有限。由于体制变革的成本过高,且充满不确定性,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问题被悬置。每一次改革都主要是为了驱使大学想方设法地争夺资源而不是创新制度。在既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为了实现创新,从政府到大学制定了种种计划,希望通过实施创新计划带来计划中的创新。但本质上,创新与计划相矛盾。创新具有不可计划性,可以被计划的很难称之为创新。创新需要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进行自由的探索。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以政府为主导,试图通过各种“计划”或“工程”来推动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并产生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实践表明,短期内通过资源的汇聚或联合攻关或许能够带来部分“创新”,但成本或代价必定是高昂的。究其原因,国家主义改革框架下,政府的计划会助长大学的惰性,而惰性体制和观念一旦扎根会严重阻碍或抑制创新行为的产生,最终使种种创新计划难以为继。我们一方面迷恋确定性的计划,另一方面又渴望原本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这实在是难以调和的矛盾。相反,若将自主权赋予大学,或许暂时会带来某种无序或低效率,但由于大学本身具有自组织的特性,而学科制度又可以自动拓展知识分工的范围,学者为了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可和社会的承认,会不断开拓新领域。随着大学主体性的建立,大学组织制度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高等教育中的创新将自动涌现,并具有可持续性。

遗憾的是,现有体制对于高等教育创新的约束是客观事实,但我们的改革不是正面应对,而是消极回避,倾向以“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来搪塞。在学理上,对于“中国特色”的理解有两个不同层面,一个是事实层面,一个是价值层面。所谓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一定是就价值层面而言,即我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在办学水平上是世界一流的(事实层面),而且可以在制度或理念方面为其他国

① 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6—218页。

② 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第49页。

家提供借鉴(价值层面)。作为常识,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与其他国家都必然会存在不同之处,但除非能够证明这种事实层面上的差异背后隐含有价值层面的优劣或高下之别,否则不能轻易称为“某某特色”,不然就有“把自然事实当作目的加以接受”^①的嫌疑。布卢姆在批评美国高等教育时曾指出:“我们的思想轮廓完全被德国思想家改变了,其剧烈程度甚至远超过德国建筑师对我们城市轮廓的有形改变。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会对精神生活天赋相对不足的国家发挥巨大影响,即使后者的军队强大无比,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②当前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由于思想和制度的创新不足,“中国特色”正逐渐沦为一种拒绝或阻碍深化改革的“托辞”。凡是政府或大学不想改或无法改的部分均可称之为“中国特色”,这无疑是对“中国特色”的极大误解。虽然我们无法严格证实国外的高等教育制度比我们优越,但至少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比国外优越。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之类的说法还是少提为好,除非我们试图把“中国特色”变成一个中性词,甚至是“贬义词”。实事求是地讲,为了应对创新匮乏所带来的危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很多“中国特色”的做法恰恰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对象,而绝非值得大力宣传的成就。

二、从大学之用到大学之思

我们时代,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增大,社会对于大学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实质性需求,即培养专业人才、提供具有创新性的技术;另一种则是象征性的,即大学要证明自己的卓越或优秀,以满足普通消费者的心理期待和资金提供者的绩效考核。当下愈演愈烈的科研评估与大学(学科)排名主要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于大学的象征性需求而不是实质性需求。在市场化的语境中,花样翻新的学科与大学排名与企业界的品牌排行榜没有本质的不同。当下无论学科的排名还是大学的排行基本上都与大学的教育使命无关,而是科研至上或干脆就是论文主义。表面上看,对于科研的重视反映了我们时代社会对于创新的期望,即以大学为基础,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社会的发展;但实质上,科研至上不过是研究型大学范式下的一种迷思。如张五常所言:“任何思想创作对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一般要到多年之后才知道,算文章数量与排名高下属无聊竞争,偏于鼓励产出形式上好看但时日的蹂躏会判为废物的学术作品。”^③世界范围内,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功使研究型成为了现代大学的“典范”。就像科学范式会束缚科学的想象力,阻碍科学的进步一样,研究型大学的范式也会束缚大学的想象力,模糊大学的本质。研究型大学范式下,由于论文发表的偏好被过分强调,似乎除科研成果或获奖之外,我们已不知如何评价大学或学科的好坏。无论何时,大学要重视科研没有错,科研本身就是大学的必选项;但重视科研不等于为科研而科研,也不等于仅仅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或应用性研究。毕竟大学不是纯粹的研究机构或科学院而是一个综合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的科研应是实现人类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而不应是“追名逐利”的一种途径。

我们时代,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促成了自然科学在大学里的繁荣,而那些自由学科和自由教育却陷入危机。在我国,现有学术政策以计划为导向,通过基金申报和项目制管理,几乎所有课题都是事前设计或规划,类似于政府采购或订货。在这种体制下,学者的研究追求的只能是眼前的利益(为课题而课题或为经费而课题),而不可能是传世的思想。“大学失去了它过去拥有的那种类似于城邦的性质,它变得像是一只客船,乘客们只是偶然的同路人,不久就会下船各奔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

① [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② [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106页。

③ 张五常:《科学与文化:论融合中西的大学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只是行政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内容。”^①传统上,大学的精华是自由教育,而自由教育的根基则是自由学科;而在研究型大学的范式下,现代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必要条件是在《Nature》和《Science》上的卓越表现。当前自由学科之于自由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自由大学之于民主社会的重要性已经降格为研究型大学之于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重要性。科学的帝国主义正在超越政治意识形态重塑大学。虽然无论在哪个国家短期内科学的成果尚不能控制政党的政治行动,但如果自然科学成果与政治意识形态发生摩擦,从长远来看,自然科学的成果最终将胜过政党的意识形态^②。毕竟无论任何政体、任何政党总是无条件地需要自然科学。党的领袖或政治家或许可以无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理论或学说,但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谁也无法否认,否则将招致规律的惩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现代以降自然科学的强力表现赢得了政府的青睐,自然科学家与政权的同盟牢不可破。在自然科学的主导下,大学从思想的中心蜕变为科学的重镇顺理成章。

当前在研究型主导的现代大学里随着人文学科式微,科学文化逐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开始主导着大学人的思维。科研评估和大学排行中对于可测量和可量化指标的筛选,造成了客观性对于主观性的侵蚀或压迫。现代大学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卓越的标准不再是哲学和社会学的,而是变成了统计学、会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于哲学的学术自由以及基于社会学的大学自治被基于政治经济学的企业家精神取代。随着合法性基础的丧失和卓越标准的变迁,大学之为大学的底线正在被突破。这种局面的出现绝对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规模太大、管理不善、质量不高、资金不足,甚至也不能归因于制度松懈、理念不彰、道德败坏、人才匮乏,说到底还是我们时代的大学已不再关注人的教育、大学人也不再以学术为天职。

对大学而言,思想创作和科学研究有所不同。科学研究所追求的“真”通常具有唯一性,可证实性,可重复性;思想的创作也追求“真”,但思想的真理不具有唯一性,亦不可重复。如果说科学发现的功用在于解释自然进而改造自然,那么思想创作的功用则在于阐释价值进而张扬价值。科学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可以躲在实验室里“成一统”,而思想的创作则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积极介入政治、经济的争论以及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对现代社会的最初设计中,人们相信普遍的思想自由值得向往,是为了给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提供支持,严格来说只有他们才配得上‘思想’二字。最初,首要的自由就是思想自由,这既是因为理性乃人类最出色的能力,也因为它是美好社会最需要的东西。若想拥有一种新型社会,为人类形成一种新的安排,就必须让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培根、洛克和牛顿能够自由思考和宣传他们的学问。”^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目的,各国政府均加大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支持,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则多有控制。但事实上,如果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受到权力的控制,思想不再自由,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很难有大的突破。毕竟制度环境具有整体性,思想领域的自由状况最终也会影响或波及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的探究。“使智识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④相反,如果在一个国家思想不自由,一切理论都必须附和官方学说,那么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下,大学在思想史上将乏善可陈。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在思想史上乏善可陈,那么这个国家的大学也很难在科学领域取得伟大的发现。智识自由既是思想创作也是做出科学发现的必要条件。

① [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300页。

② [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250页。

③ [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214页。

④ [英]弗里德里希·奥克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三、重申大学的制度含义

在西方,大学不仅代表一类组织,也不仅象征着某种精神,同时也是一项制度。大学作为一项制度与大学制度并不是一回事。大学制度是指与大学相关的制度安排,而大学作为一项制度则意味着在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大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齿轮”。大学作为制度的存在增加了社会诸“齿轮”之间的“咬合”,可以有效地避免社会制度的空转。长期以来,我们将大学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只是就组织层面而言,如果在制度的层面上,社会也是大学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的“工作母机”;若失去了大学对于人的规训,现代社会不可能正常运转。相比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些具体的职能,大学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的规训才是最重要的。“大学对于个体实际统治能力的培养是无效的,不过,在大学层面拓展政府治理却是最佳的场所。将知识与权威结合起来,这是所有原则的基础,大学正实现了这种需求。换言之,大学不单纯传授知识本身,它将知识的整个体系的形成与人们对世界的假设结合起来。一句话,与身为组织的大学相比,身为制度的大学更加重要(也更有效)。”^①当然,大学作为一项制度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其大前提是存在自由民主的政体。一旦制度环境不允许,大学的制度含义就会消失,而只是作为一种干瘪的组织机构而存在。一般而言,在自由民主政体下,大学易于彰显其制度价值,而在专制政体下,大学则只能作为一个专业性组织机构为政府服务。“大学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它使原则保持生机,是保持这种政体运转的知识和教育的不竭源泉。……自由的大学只存在于自由民主政体之中,而自由民主政体也只存在于有自由大学的地方。法西斯制度拒绝理性并控制了大学。苏联的制度断言,人民在先锋党的呵护下已经成了理性的人民,所以大学不再需要一种特殊的地位——也就是说,它可以受党的控制。只有自由民主政体同意把理性放在第一位,尽管人们并不认为它的公民既单纯又一贯讲究理性。它保证大学享有特殊的地位,这使它不必拘泥于文明社会中的思考和言论所受到的一般道德和政治限制。”^②由于政体的差异以及基于政体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制度环境,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侧重的仍然是组织层面,即力争将大学打造成卓越的专业性组织,相关的制度建设浅尝辄止(局限于大学内部),对于大学本身作为一项制度缺乏清醒的认识。“大学的繁荣是因为大学被认为能够按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而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服务于社会,或像泰勒斯那样不能服务于社会。”^③换言之,现有体制下,大学的重要性建基于科学技术的实用性而非思想的深刻性或制度的公共性。

作为欧洲文明的精华,大学与民主政体有天然的亲合力。世界其他文明当中不乏有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但与兴起于中世纪的大学均有本质的差别。欧洲独特的法律制度、城市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铸就了欧洲大学模式的特殊性。19世纪以来,世界各地虽然纷纷引入欧洲模式的大学,但时至今日,若以文明类型来划界,世界一流大学仍然主要分布在西方,若以政体划界,世界一流大学几乎全部位于民主国家。作为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德国的大学曾是世界一流,然后20世纪30年代随着纳粹的上台,德国的民主政体转变为法西斯统治,德国大学很快一蹶不振,失去世界一流的地位。作为对比,亚洲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制度文明上逐渐“脱亚入欧”,二次大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更是成功建立了民主政体,日本的大学也因此开始在全球占据显赫的地位,成为除欧美之外世界一流大学最集中的地区。基于教育体制与国家体制的相关性,

① [美]帕翠西亚·冈伯特:《高等教育社会学》,朱志勇、范晓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1页。

② [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213—214页。

③ [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241页。

民主政体是大学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缺乏民主制度的有力支撑,大学将失去制度与理念上独特性而蜕化为一个一般性的专业组织或学术机构。在一些专制国家里,那里的大学偶尔也可以做出伟大的发现或发明,甚至也可以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农业、军事和国防的现代化,但那里的大学很难成为伟大的大学。因为在专制国家的大学里能够得到发展的只能是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思想的自由或自由的思想创作不被允许;为了专制统治的可持续性和政权的稳固,政府通常会根据统治需要的正当性肆意操纵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专业知识的生产,并进而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控制国民的大脑。“在专制国家,权力的领域、法律的领域和知识的领域被压缩到一起。关于社会终极目标的知识和管理社会实践的规范都为权力所有,与此同时,权力控制了对话,并随意描绘现实。”^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但相关改革一直深陷经济决定论的误区,无论政府还是大学似乎都倾向于相信,通过不断增加投入或集中资源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有学者甚至通过比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来评估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需要巨额的经费投入,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绝不是有了巨额的经费投入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从根本上还是一个制度建设,尤其是制度环境建设。没有一流的制度(环境)不可能建成一流的大学。那么,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呢?最基本的就是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的自治化。只有具备了上述基本条件,大学本身的制度含义才能得以彰显,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重要性才能受到政府的理解,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均处在转型过程中,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与社会的自治化改革已经部分启动。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政治、经济与学术的价值分野不明显,权力欲望、逐利之心与学术发表的内在冲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发展中学术”的典型特征,即学术作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其专业性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学术规则经常被其从业者践踏,学术成果的评价经常受非学术因素制约,学者和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大多是为了知识之外的目的而非为了知识本身。近年来,凭借科研论文发表上的卓越表现,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和学科排行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绝不意味着大学或学科排名上的名列前茅,而是要切实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原创性的贡献。根据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根据高等教育发展和一流大学成长的规律,要实现这一愿景,仅仅依靠重点建设和增加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断通过体制改革,真正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的自治化,高等教育强国之梦才能真正实现。体制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有利于追求真理,学者和科学家才能被引导至学术领域,大学的发展才会具有可持续性。如果相关制度不利于学术职业的发展,遵循趋利避害的一般原则,学者和科学家会逐渐从“求真”转向“逐利”或“寻租”,学术领域不可避免地将被政治或经济的逻辑所侵蚀,从而导致知识阶层的官僚化以及知识本身的商品化。大学应致力于追求真理,权力和利益的过多卷入终将不利于学术发展。

四、重建高等教育的合法性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但这种奇迹仅仅是就规模和数量而言。通过

^① [美] 罗伯特·波斯特:《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左亦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大扩招的确有更多的学生进入了大学,但是否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能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则存在很大的疑问。事实上,不仅中国如此,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均面临教育性危机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回应民众对于高等教育的不安和质疑,很多大学引入了质量保障系统。但良好的教育和高质量的教育仍然有所不同。质量的高低取决于质量标准的设定或评估指标体系的选择,而好的教育则着眼于人的发展,与外在的标准无关。实践中,高等教育中的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也许可以交由专家评估,用质量的高低来衡量,但涉及人性培养的通识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则只能交由学生自己来体验。遗憾的是,当前的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差别被忽视,且处在边缘。对教育好坏的判定更多依据外部功利的或实用的标准而不是教育本身卓越与否。学生只是机械地修完学分以获得相应的学位,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少有人去关心。“它的实际后果便是,一方面使大学外边的庸俗现象得以在校园内泛滥,另一方面又把更严厉、更刻板的要求——由专业学科提出的那些未经通盘考虑的、专横而堂而皇之的要求——强加给学生。”^①由于高等教育的工具性遮蔽了高等教育本身的重要性,大学“失去灵魂的卓越”几乎成为某种必然。

为回归高等教育本身,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世间万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相对独立的。任何问题既需要系统思考也需要独立决策。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镶嵌于社会大系统之中,高等教育问题既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但毕竟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社会是社会。高等教育的内部事物的处理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事物的处理完全不相关,绝不能基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将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处事规则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就高等教育谈高等教育容易忽视高等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但若将所有的高等教育问题都归为社会问题或引出社会的根源也会失之偏颇。高等教育的重要源于对真实生活的表达,对于人性的培养与塑造。由于我们误将高等教育的有用性作为其重要性的主要根据,现代社会只能基于工具理性来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进行辩护。其结果,那些表面上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由于忽略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反倒更像是对于高等教育功能的滥用而不是真正重视高等教育本身。实践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既不能沉迷于个人精神层面的抽象概念,也不能因为忽视高等教育的本质而从实用走向滥用。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讲究成效,但也不能为了“功利”而放弃“理性”。

古典时代,教育主要是精英阶层的一种精神性活动,和物质生产没有关系或关系较为疏远。现代社会教育逐渐世俗化,自由教育意义上的教育逐渐被技术或职业教育意义上的教育所取代,教育的精神性逐渐被生产性取代。伴随教育本身的世俗化,和教育相关的概念也不可避免的世俗化。“原本用来描述和激励贝多芬、歌德的词语,现在每个学龄儿童都在使用。”^②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教育领域还发明了许多新的说法,比如,创新、创造性、价值、个性、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经过大众媒体以及自我的不断重复,无理解解还是不理解、赞同还是不赞同,这些概念都已成为我们思想或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很多时候离开这些概念我们甚至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套话或套套逻辑(tautology)的大量存在,极大影响了我们对事物本身的重要性的感受、理解和表达,使我们弄不清语言或文字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套话。所谓套话就是大家都这么说,但没有人清楚这种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模式、世界一流大学、国家重点学科、特色专业、精品课程、教学名师等。

历史上,古典高等教育以普遍知识或自由知识作为知识论和认识论基础,现代高等教育则以高深知识或专门知识作为知识论和认识论基础。以普遍知识或自由知识为基础,古典高等教育的精华为

① [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288页。

② [美]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139页。

自由教育,注重无用之用;以高深知识或专门知识为基础,现代高等教育的支柱是专业教育,强调有用之用。从古典到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基础虽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知识本身始终处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地位,高等教育系统始终围绕知识进行组织和运转。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知识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后现代社会也一度被称为知识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对于知识的崇拜可以看作现代性的残留,它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迷信”。现代大学对于科研的痴迷以及对于“用途”的迷思是高深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逻辑的必然结果。当前伴随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高等教育面临深刻转型,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的关系也面临调整。后现代社会仍然需要高深而专门的知识,但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将不再是生产、传播与应用高深知识那么简单。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极大地改变高深知识的性质及其生产、传播与应用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是知识密集型的行业,但在后现代社会高深知识的分布将更加均匀,知识的密集将不再是高等教育行业的显著特征。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后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只要愿意都可以拥有丰富的知识。在此背景下,现代高等教育对于高深知识的垄断将消失,高等教育必须回归教育本身以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

后现代社会中高深知识若不再是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大学若不再以科学研究见长,那么高等教育的重点自然将转移到高等的教育,即成人。与知识的工具性相比,成人本身即是目的。从古典到现代,高等教育之所以一直是知识中心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等同于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大学。以组织机构为核心,制度化的高等教育模仿工厂的运行机制,以知识为原料易于操作,诸如人性的培养、德性的养成等不易制度化的部分则被舍弃或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实现需要组织机构作为载体,但必须要超越组织机构,这就是高等教育与大学的区别。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大学校园’,显示自己是最高使命的教育——即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①虽然古典高等教育也曾以“成人”为目的,追求幸福与德性,但由于经济社会条件所限,当时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非常之少,所谓的“成人”只能是“成极少部分人”。相比之下,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趋于普及,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此时高等教育作为“成人”的教育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蒋永华)

How to Recreate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Era

WANG Jian-hua

Abstract: The biggest challenge imposed by the present era is how to make innovations. In order to meet the expectation for innov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trapped by the competi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papers as its major end. As a result, the university is now regarded as a knowledge factory or a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 instead of the center of thoughts. To rebuild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era, we must shift our focus from 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 to the problems it faces, reiterate the meaning of university systems, rebuild the legitimac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atch new thoughts by ide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system; innovation; use; thoughts

^①徐贲:《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